



运河学研究院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主办

运河学研究

第1辑

CANAL STUDIES NO.1

李泉 主编

历史上水利工程的环境问题值得关注（邹逸麟）

运河学发微（李泉）

《中国运河志·图志·古地图卷》综述（李孝聪）

金元时期北运河河道勘测——基于楼子村落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陈嘉波）

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帝国晚期济宁城市文化的形成（孙竟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運河學研究院

李泉
主編

CANAL STUDIES NO.1

運河學研究

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 主辦

第1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运河学研究. 第1辑 / 李泉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201-2577-2

I. ①运… II. ①李… III. ①运河-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K928.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3896号

运河学研究 第1辑

主 编 / 李 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韩莹莹

责任编辑 / 赵晶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62千字

版 次 /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577-2

定 价 / 8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运河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邹逸麟	李孝聪	科大卫	赵 毅	张廷皓
委	员	许 檀	常建华	赵世瑜	张瑞威	吴 琦
		孙竞昊	张士闪	马俊亚	吴 滔	倪玉平
		李 泉	王 云	吴 欣	丁延峰	陈诗越
		李德楠	郑民德	朱年志	胡克诚	陈丹阳
主	编	李 泉				
编	辑	朱年志	胡克诚			
英文	编辑	陈丹阳				

创刊词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8日设“运河学笔谈”专栏，刊发《运河学研究方兴未艾》一文。用“方兴未艾”这个词诠释近几年运河学发展的状态，再恰当不过了。据统计，2014年以来，每年都有10余项关于运河的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有10余部著作问世。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每年在200篇以上，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些文章发表在各种不同的刊物上，查找阅读很不方便。于是不少业内朋友建议我们创办一本关于运河的刊物，为从事运河研究的同仁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经过一番思考和筹划，今天这本刊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本刊以“运河学研究”为名，实在是因为舍此无法全面囊括近年相关研究的内容。“运河学”这个概念，在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提出，至今已有十几年时间，后赞同者多，质疑者鲜有，也有不少学者写文章讨论其内容和研究方法。就内容而言，它包含运河本体的研究，如运河发展史、运河与生态环境变迁、河道工程设施、河务管理等；也包括运河与区域社会的研究，如漕运与交通、运河城镇带、商业手工业与服务业、农业开发、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文化及文化遗产。运河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中既有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其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学科的许多领域，可以包容关于运河研究的方方面面。

本刊是一本综合性学术刊物，所刊论文以社会科学为主，也会刊登与运河有关的自然科学如地理、工程、水利、环境等方面的论文。我们还将开辟一些研究专栏，主要有：“理论研究”，着力进行运河学及相关研究方向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探讨；“专题研究”，探讨运河发展史、运河区域社会变迁、运河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新书评介”，点评当年出版的学术

著作，向读者介绍其价值及阅读路径；“研究综述”，评介当年运河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总结过往，为读者提供学术资讯；“史料拾遗”，对新近发现的与运河相关的新史料进行解读，以达到学界共享之目的。

本刊物一年两期，分别于年中和年末出版，欢迎学界贤达赐稿并提出批评意见。

目 录

· 理论研究 ·

- 历史上水利工程的环境问题值得关注 邹逸麟 / 1
运河学发微 李 泉 / 3

· 专题研究一：文献研究 ·

- 《中国运河志·图志·古地图卷》综述 李孝聪 / 33
清代《大运河全图》释读 王 耀 / 50
山东方志运河文献纂修及价值述略 周广骞 / 57

· 专题研究二：河工、河政与漕运 ·

- 金元时期北运河河道蠡测
——基于楼字村落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 陈喜波 / 72
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 钟行明 / 98
清中后期漕运水手行帮组织向青帮演变之
社会生态初探 曹金娜 / 132

· 专题研究三：运河城市文化 ·

- 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帝国晚期济宁城市
文化的形成 孙竞昊 撰 陈丹阳 译 胡克诚 校 / 145
明清皇家用砖“临清砖”的种类、烧制地区、
管理机构及其变化 苗 菁 / 175

· 专题研究四：大运河文化带 ·

- 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思路研究 马智慧 赵丁丁 楼微君 / 187
浅论运河沿岸江南古镇文化展示之新思路 郎 净 / 203

· 研究综述 ·

2016 年度运河学研究综述 高元杰 / 212

· 新书评介 ·

郑民德著《明清京杭运河沿线漕运仓储

系统研究》简介 窦重沂 / 229

王耀著《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简介 李 鹏 / 231

稿 约 / 233

注释规范 / 234

主办单位简介 / 237

Content

• Theoretical Studies •

-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Caused by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History is Worthy of Attention *Zou Yilin / 1*
Explaining the Subtleties of Canal Research *Li Quan / 3*

• Special Topic I : Literature Studies •

- Summarize of Antique Maps for the Grand Canal
Records in China *Li Xiaocong / 33*
The Study on the Map of Grand Canal in Qing Dynasty *Wang Yao / 50*
The Compilation and Value of Canal Literature in Shandong
Local Chronicles *Zhou Guangqian / 57*

• Special Topic II : River Project, River Administration and Grain Transport •

-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Channel of the Beiyunhe River duri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Study of Village Names with
Lou in Huanghe River Basin *Chen Xibo / 72*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Grand Canal's Management
System in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ong Xingming / 98*
Study on the Social Ecology of Change from Grain Transport
Association to Gangdo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ao Jinna / 132*

• Special Topic III : Culture of Canal Cities •

- A Jiangnan Identity in North China: The Making of Jinling Urban
Culture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Sun Jinghao; Translated by Chen Danyang;
Proofread by Hu Kecheng / 145*

- The Type, the Burning Area, th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Change of “Linqing Brick” Which was Used as the Royal
Brick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iao Jing* / 175

• Special Topic IV: Grand Canal Culture Belt •

-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Belt Construction in Hangzho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Ma Zhihui, Zhao Dingding and Lou Weijun* / 187

- Talking about the New Ideas of the Cultural Exhibition of the
Jiangnan Ancient Town along the Grand Canal *Lang Jing* / 203

• Literature Reviews •

- Canal Research in 2016: A Literature Review *Gao Yuanjie* / 212

• Book Reviews •

- Zheng Minde, Research on the Storage System of Grain
Transport along the Beijing-Hangzhou Canal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ou Chongyi* / 229

- Wang Yao, The Painted Maps of the Grand Canal: A Study of the
Ancient Maps of the Grand Canal in Qing Dynasty *Li Peng* / 231

Instructions for Authors / 233

Annotation Specifications / 234

Introduction to the Sponsor / 237

历史上水利工程的环境问题 值得关注^{*}

邹逸麟^{**}

明清时期国家级水利工程主要有二：一为治黄，二为通运。又因徐州以下，黄河河道即运河河道，故明清时期“治河即治运”，河运合一。这是明清两代朝廷最为关注的事。当时对工程最有影响的是“黄运地区”，即今黄河以南，废黄河故道以北，大运河以西地区的今鲁、豫、苏、皖四省交界处，是明清两代河患最严重、社会经济最凋敝的地区。本书即研究该地区在明清两代的河工设施和其对环境的影响。

对这个地区明清两代的河工设施，前人已有较为详细的研究，而河工对该地区环境的影响，前人虽有涉及，但还不够深入，本书的重点即在此。

大凡一水利工程设施之初，必为改善某一河流水利条件为目的，或防洪，或疏淤，或分水，或改道，等等，然事务十分复杂，有始料不及者。如河道即运道之徐州东南徐州、吕梁二洪，为河道上两处险滩，乱石盘踞，水流湍急，运舟至此，往往有覆舟之患。故明嘉靖年间，多次凿治乱石数百块，按理当可缓解河道的危险。孰料原先乱石可阻激泥沙，被凿后，水流缓慢，反而造成泥沙淤积，此为始料未及的。又如“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为明清两代治河不移方针，确实起过保障河堤的作用。然而

* 本文系邹逸麟先生为李德楠副教授新书《明清黄运地区的河工建设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所作的序言，题目、引文注释均为编者所加，特此说明！

** 邹逸麟（1935～），浙江宁波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及运河史、黄河史。

客观上又使河道长期不旁泄，泥沙在河道迅速淤积，形成地上河。一旦决口，危害更大。又如，山东运河沿线的北五湖、南四湖，当时筑堤成湖，目的是调节运河水源，使其有蓄有泄。孰料日久淤浅，且造成湖泊周围环境的变化。又，明弘治八年（1495）在黄河北岸修太行堤，是明代黄河变迁一大事件。以后黄河不再北决，全线南决入淮，黄河河口不断向外延伸，促使苏北地区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上述有关河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较详尽的分析。

河工物料的采用与植被环境变迁的研究，为本书重点并且是较为突出的部分。这是以往研究者比较忽视的地方。河工物料对治河者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河防全在岁修，岁修全在物料。”^①故采办物料为河防第一要务。可用作河防的物料众多，其中有关植物的主要为桩木、软草、苘麻、柳枝、芦苇、秫秸等等。而其中以桩木为最主要，因为是签钉埽厢、坚筑石工的基址，其用料有柳、榆、杨、松等等，供应困难时，也可用楝、椿、枣、栗等杂木代之。然河工地点易变，临时工程居多，所谓“河岸险工迭出，处处紧要”^②。且需要数量特多，康熙年间河督靳辅统计，岁修需柳100万束。每年都需准备大量河工用料，遂为地方上一大负担。为此，沿河地区平时种植大量柳树，一时造成“堤柳成林，淡烟笼翠，翠荫交加，映蔽天日”^③的优越环境。但为时不久，一旦河工需要，平时所种柳木杂草即消耗殆尽。在康熙年间一次河工堵险用料时，因“无柳可用，将民间桃、李、梨、杏尽行斫伐”^④。民间生活受到了影响。总之，治河工程在用料方面对当地的自然和经济社会均产生严重影响，并且是长期持久的。故而黄运地区在明清两代成为我国东部最贫困的地区是不足为怪的。

总之，本书以黄运地区为例，探索了河防工程对沿河地区的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事实上，我国其他地区水利工程也同样对当地环境发生过影响，甚至其影响更甚于黄运地区。故本书对研究历史上水利工程的环境反映，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责任编辑：胡克诚）

①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4《修守事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再续行水金鉴》引《两河奏疏》，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第46页。

③ 转引自贾乃谦《明代刘天和的植柳六法》，《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④ 《清史稿》卷273《佟凤彩传》，中华书局，1976。

运河学发微

李 泉*

内容提要 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建筑工程，它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其影响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一部中国运河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揭示运河的功能和社会影响，保护、传承运河文化，是我们建立运河学的初衷。运河学研究的内容包括运河本体研究和运河与区域社会研究两个方面，涉及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运河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完全可以支撑起这门学科。运河学属交叉或边缘性学科，其中既有社会科学内部各分支学科间的交叉，也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交叉。运河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汇集综合。

关键词 运河学 大运河 中华文明 运河文化

运河是用于交通运输的工程化的水道，同时在排水、引水、灌溉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工程化的水道”，是指人工开挖的河道或利用工程设施渠化了的自然河道。中国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其规模之宏大，历时之久远，作用之巨大，文化内涵之丰富，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均非其他工程之可比。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建立运河学的问题。随着运河及区域社会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赞同^①。

* 李泉（1949～），山东嘉祥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运河史。

① 21世纪初以来，杭州王国平多次提出建立运河学的问题。2009年以后，土建专家罗哲文也几次在会议上发言，提议建立运河学（参见罗哲文《运河申遗应建立运河学》，《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2期）。此后，学界经常有人撰写文章表示赞同，并讨论运河学的相关问题。2016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以《运河学研究方兴未艾》为题的“运河学笔谈”，就建立运河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参加笔谈的有邹逸麟、李孝聪、陈力、常建华、李泉、吴琦、张士闪、吴欣。

本文首先探讨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功能,说明建立运河学的必要性,然后讨论运河学研究的内容和理论方法。

一 运河在中国文明史上的意义

运河和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项建筑工程,它们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写照。但是,长城是防御性工程,它的价值取向是封闭、排外的,其中多少透露出一些屈辱。运河是综合性工程,它的价值取向是开放、进取的,所蕴含的是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反观中国古代历史,运河发挥的作用和社会影响,远远大于长城,远远大于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项建筑工程。

(一) 运河的政治功能

西周实行分封制度,诸侯林立,各自为政,王室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势力较小的诸侯国相继被兼并,政治大一统的趋势开始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的几个诸侯国相继开挖连通自然河道的运河。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苕水,率兵由运河北上,争当中原霸主^①,开启了南、北诸侯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加快了国家统一的步伐。到战国初年,春秋时期的上百个诸侯国已缩减为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局部统一。这时由西向东扩张势力的魏国大举开挖治理鸿沟^②,使东、西各诸侯国的交往更为密切。要之,运河在中国统一进程中应运而生,它改

① 《左传》哀公九年(前486):“吴城邗,沟通江淮。”吴修筑邗城,后人称其所开运河为邗沟。杜预注称邗沟为韩江,《水经注·淮水注》称其为溟沟、溱水,《汉书·地理志》称其为渠水。据《国语·吴语》载,吴王夫差战胜齐国后,于公元前484年在商(今河南商丘)、鲁(今山东曲阜)之间“阙为深沟”,沟通了泗水和济水。《水经注》载,苕水在定陶(今山东定陶)东北从济水中分出,东流至谷庭(今山东鱼台)入于泗水。定陶离商丘很近,溯泗水而上则可达曲阜,因此夫差所开的通于齐鲁的“深沟”就是后来的苕水。

② 大约在魏惠王十年(前360)至十八年(前352),魏国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兴修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鸿沟。鸿沟不是一条单一的水道,而是由几条运河构成的水系。其主水道由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东行,过魏都大梁转而东南流,至陈(今河南淮阳)折向南流,入于颍水。鸿沟在大梁附近出现了几个分支:其中洧水(下游称获水)流经今河南兰考与商丘之间,东至彭城入于泗水;睢水流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睢阳,向东南至江苏睢宁东入于泗水;泗水与淮水通,所以这两条运河都可沟通黄河与淮河。另外,鸿沟水系的涣水从大梁南向东南流,至安徽五河县入淮水,直接连通了黄河与淮河。

善了中原和东部各地区之间的交通条件，区域联系加强，为全国一统奠定了基础。

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建立起水军，称为“楼船之士”。灵渠开凿后，军需得以及时补充，战胜南越，使秦朝疆域达于岭南^①。从理论上讲，当时由关中地区沿水路可以直达广东，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大一统奠定了交通方面的基础。后来汉武帝训练水军，出兵岭南，设置郡县，对南方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大一统局面得以巩固。曹操统一北方，征战乌桓，每次大战的胜利，都得益于运河交通的保障^②。隋炀帝开挖运河后，沿运河巡视南方，走运河出兵北方，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至为明显^③。唐宋以后，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常常被它的经济作用所掩盖，但是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乱时期，运河军事运输和政治控制的作用都十分明显。安史之乱中，叛军占据洛阳，切断了运河交通线，唐中央政府和东部地区的联系断绝，朝廷顿时乱了手脚，玄宗乃仓皇出逃。安史之乱平定后，政府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整修运河，恢复运河交通。北宋极力经营御河^④，因为它是向北部边境运送军事物资的通道。金朝为了向南方用

① 秦攻灭山东六国后，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派大军五十万，分五路南下进攻岭南地区。其中一支军队由番禺（今广东广州）西进，受到生活在今广西一带的越族西瓯人的顽强抵抗。那一带山峦起伏，粮草给养运输困难，军队前进受阻。双方相持三年，秦军伤亡惨重。为解决军需给养的运输问题，秦监御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挖灵渠，建设分水工程，筑拦河坝抬高水位，设陡门逼水流向高处。沟通了湘江和漓江，连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

② 官渡之战后，曹操北征袁氏政权，于建安九年（204）率军渡黄河，修筑大坝拦截淇水，使之流入白沟，将白沟开拓疏浚，用以运送军粮。此后，曹操又继续向北开挖引漳沱水入泲水的平虏渠，从平虏渠入泲水处向北开挖了纵贯泉州县（今河北武清南）东部的泉州渠，又由泉州渠向东沿海边开挖了新河。建安十八年（213）开挖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曹操开挖的这些运河，沟通了南起黄河，中经清水、漳水、淇水、洹水、浚水、易水、洮水、沽水、滹沱河，北至海河水系的许多自然河流，便利了曹魏政权对华北地区的控制，其中有些河段为隋代京杭运河所利用。

③ 隋炀帝迁都洛阳后，于大业元年（605）开挖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同年，整修山阳渚（邗沟）。大业四年（608）春，在黄河以北开挖永济渠，北达涿郡蓟县（今北京市）。大业六年（610）十二月，整修江南河。以上四条运河首尾相连，以洛阳为中心，南可通过通济渠、山阳渚、江南河到达余杭，北可进入永济河抵达涿郡，中国历史上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最终形成了。由洛阳溯黄河西行，入关中的广通渠，可达隋初的都城长安。

④ 《资治通鉴》卷268《后梁纪三》，胡三省注曰：“隋炀帝大业四年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后人因谓之御河。”后阻断沁水，以卫辉苏门山百泉为水源。因河道流经古卫地，故多称其为卫河，其中临清到天津的河段清雍正以后称南运河。

兵，也十分重视对御河的培护。元朝在进攻南宋的过程中，曾经在山东境内疏通河道，开挖运河，为输送军需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也为开挖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积累了经验^①。元明之际，朱元璋军队北攻元朝大都，大将军徐达曾在济宁一带开耐劳坡口、塌场口^②，舟船由淮水入泗水，而后达于山东、河南。清代康熙、乾隆皇帝为了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控制，多次沿运河南巡^③，运河的政治功能更加显明。在一次又一次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运河在发挥作用。大运河是一条政治之河，是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

秦汉以后，影响中国统一的政治势力主要来自于北方，在辽阔的草原上，善于骑射的游牧部族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时刻谋求向内地扩张，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南北之间的军事对抗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原王朝为抵御北方政治势力侵扰，多建都于北方，以北方或西北地区为政治军事中心区域。但是秦汉到魏晋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在东部地区，唐宋以后转移到了东南江浙一带。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文化重心长期偏离，如果不能将两个区域紧密连接起来，势必影响国家政治稳定，难以建立起政治一统的国家。怎样将两个相距较远的区域连接起来？唯一的办法是开辟稳定顺畅的交通路线。于是，各个朝代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运河，严格管理，精心培护。不管是强盛的汉唐，还是大一统的明清，都把运河作为京城物资供应、强化区域政治军事联系的南北通道。康熙皇帝亲政后，在宫中的柱子上写下当时的朝政要务：三藩、河务、漕运^④。三件

① 元代开挖贯通北京城的通惠河，整修通州至直沽（今天津附近）的白河（北运河）、直沽到临清的卫河（南运河），在山东西部地区开挖会通河，疏通淮扬运河（里运河）和江南运河，从此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② 《明史》卷83《河渠志一·黄河》上：“明洪武元年，（黄河）决曹州双河口，入鱼台。徐达方北征，乃开塌场口，引河入泗以济运，而徙曹州治安陵。塌场者，济宁以西，耐劳坡以南，直抵鱼台南阳道也。”

③ 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间六次南下巡视，南巡的路线多为乘船沿运河经今河北、山东、江苏到达杭州，然后返回京城。南巡的主要目的是视察黄河运河重要工程，同时查访吏治民情，笼络汉族士大夫。乾隆皇帝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间也曾六次南巡，除视察河工外，还多次前往海宁一带，视察海塘工程。他曾在江宁（今南京市）、京口（今镇江市）和杭州举行盛大阅兵式，炫耀武力，威慑南方士民。

④ 康熙皇帝曾经对大臣们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靡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今尚存。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匪轻。”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大事中两件与运河有关。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重点关注的就只有河务和漕运了。康熙、乾隆多次南巡，一方面是为了威吓、笼络南方士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河工及漕运，保证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朝代为了保障京城的粮食及其他物资供应，建都在离东部地区较近的洛阳、开封等地。这些地方地处南北大运河中段，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依然比较显著。比较而言，这些朝代都不甚强盛，除东汉和西晋为统一王朝外，其他朝代都难以摆脱分裂和动荡的局面。至于建都在南京和杭州的几个朝代，多处于分裂割据时代。历史事实说明，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只有以北方为国家政治军事中心，才能建立起统一的强大政权。而政权强盛、稳定的重要条件是运河交通畅达。大运河是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支柱，反过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中国古代的长期统一。

（二）运河的经济功能

在交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动脉，不仅承担着漕粮运输的任务，也是区域物资交流的通道，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相邻的其他区域。

西汉时期，政府每年都要通过黄河、渭河及关中漕渠将山东、河南等地的粮食转运到京城长安，于是建立了漕运制度。东汉修治汴渠，隋唐通济渠（汴河）畅通，漕运便捷。宋代以后，江浙地区成为粮食主要产区，南粮北运的格局逐渐形成。运输漕粮是大运河的最显著的功能，所以人们将其称为漕河^①。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畅通无阻，每年船运京城的漕粮在四百万石以上，从此大运河成了国家“命脉攸关”^②的漕运通道。把几百万石粮食从南方运到京城，运输费用很高。政府既要漕运军卒承担繁重的运输任务，又不愿付给他们与劳动量相当的报酬，于是沿袭宋代的做法，允许他们运输漕粮时顺便从事私货贩运作为经济补偿，以提高其从业

① 漕河之称始于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称韦坚在关中所开的运河为漕河，刘昫等《旧唐书》将流经扬州、洛阳的运河称漕河（参见《旧唐书》卷17上《敬宗、文宗本纪》、卷37《五行志》、卷86《高宗、中宗诸子传》）。张廷玉等《明史》卷85《河渠志三·运河上》：“淮扬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谓之转运河，而由瓜、仪达淮安者又谓之南河，由黄河达丰、沛曰中河，由山东达天津曰北河，由天津达张家湾曰通济河，而总名曰漕河。”可见，明代将南北京杭大运河统称作漕河。

②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6，引明代总河曹时聘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